

购粮证的故事

□梁晓声



全国通用粮票票样



哈尔滨市粮票票样

城镇人口,出生享有一份口粮

购粮证退出咱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,只不过才三十几年前的事罢了。

话说“早年间”,在咱们中国,凡属城镇人口,出生的当日便享有一份国家规定的口粮。按说吃奶的婴儿吃不下粮食,不应享有一份口粮——当年国家向民间供应粮食的政策蛮人性化的,考虑到母亲十月怀胎不易,一朝临盆,身体必消耗巨大的能量,在“月子”里,须哺乳婴儿,亦须恢复自己的体质,所以怀孕三个月或四个月后,便于平常口粮之外,每月另行补给一斤小米、一斤大米、一斤白面,豆油也会相应地增加二两。三种特供细粮,允许按个人意愿只买一二种,但三斤的总量不得突破。婴儿出生后,虽然还不能吃粮食,家庭成员毕竟实际上多了一口,且哺乳时期的母亲为了保持奶水充足,细粮需要又大了,故又特供三斤细粮。尽管仍是补给给母亲的,体现在购粮证上,却是婴儿名下那份了。当然,并非全国统一的规定。对有城镇户口的孕妇及婴儿,实际口粮供给方面的照顾是大原则,各地可按各地的具体情况落实。

婴儿出生后的头等大事是顺利地落上户口。普遍而言,其名也就被添

在购粮证上了。

当婴儿成长为小学生了,他或她便已享有14斤口粮供给了;小学五年级后增加到16斤;初一增加到18斤;初二增加到20斤;初三增加到22斤;高一增加到24斤……高三学生的定量是28斤。28斤的口粮定量是什么概念呢?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每月的口粮才28斤半。早年间,在东北三省,凡属知识分子,口粮必是28斤半。“28斤半”,也是早年间三个省份知识分子的自我戏称。

但不论在小学、中学或大学,体育老师们的口粮都会多一点儿,30斤左右。工厂车间工人即操作车床的工人们,口粮似乎是32斤。重体力劳动者,如钢铁厂的工人、建筑工人、搬运工人,口粮似乎是34斤、36斤不等。煤矿工人的口粮是38斤,或40斤。当年,在全国口粮最高的是东北林区的伐木工人——45斤。

伐木之季主要在冬季,冬季的东北林区,严寒每至摄氏零下40度左右,伐木工人不多吃点儿,身体热量顶不上,干一会儿,出一阵汗,之后就扛不住冻了。工种特殊,劳动的自然环境特殊,给他们定45斤的口粮,连煤矿工人也没意见。

平常日子难得吃上大米白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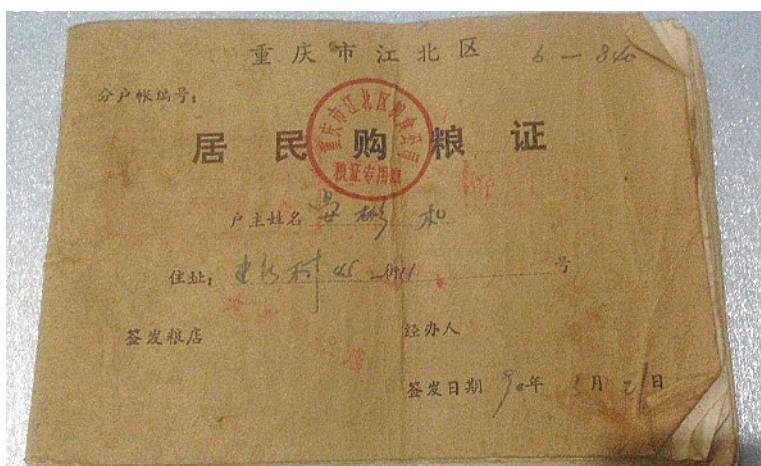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记忆中,似乎男孩女孩在成长期的口粮定量也有区别——女孩的口粮一直比男孩少一斤,参加工作后才在脑、体力劳动和工种同类的前提下持平。不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,粗粮、细粮的供给结构却基本是相同的,以黑龙江省而论——每月小米一斤、大米二斤、白面五斤、豆油半斤,其余为高粱米、玉米碴子、玉米面。

若一户六口之家的人口结构是这样的——一位老人,中年夫妇双方,三个孩子,那么他们每月的口粮如下:三斤豆油、三十斤白面、十二斤大米、六斤小米,其余为粗粮。看起来不少,但一平均,每天只不过一两豆油、一斤白面、四两大米、二两小米。

细粮要先保证上班的父亲带饭。

若此人家孝敬老人,老人也会多吃点细粮。最小的儿女往往会受到偏爱,与老人享受差不多的吃饭优待。那么,做母亲的和两个大龄孩子,平时吃到馒头、大米饭,喝上小米粥的几率极少。细粮也不可以月月吃光呀,平时得攒下一点儿,为春节那几天饭桌上体面,也为平常日子难得吃上大米白面的孩子们解解馋。

这是从前的孩子们倒数着日子盼过春节的真相之一。别说孩子们了,大人也盼着过几天顿顿吃细粮的日子啊。所以,从前的中国人过春节的欢乐程度高,并不意味着常态的生活幸福指数多么高,恰恰证明了只有过春节那几天,才有所谓吃的幸福感可言。



上世纪城市居民购粮证

粮店、粮票和口粮补助申请

由购粮证的存在,产生了粮店、粮票、申请口粮补助及细粮补助等事。

每几条街区便有一处粮店,必须的。否则,人们到哪儿去买粮呢?当年,在中国的城镇,粮店比邮局多。每月限定了每人可凭购粮证领出粮票的斤数,领出几斤粮票扣掉几斤粮数。若谁家有人出差须多领粮票,得出示单位证明。限定粮票领出,是为了防止粮票在黑市上的倒卖。谁家口粮不够吃,申请补助是极麻烦的过程——街道小组长在申请书上签字盖章;街道主任签字盖章;城市公社批准盖章,之后报到区里;区里批准了也没实际作用,还得报到市民政部门。市里也批准了,才算申请成功了。谁家若有长期病人想要增加几斤细粮则过程相对简单,区里批准就可以了,因为增加细粮以减少粗粮为前提,总供给斤数未变。而且,最多也就是增加四五斤罢了。即使真有长期病人的人家,大抵也嫌麻烦并不申请,而宁肯全家都少吃细粮,省出细粮给病人吃。

因为我父亲在“三线”,我母亲成为全家口粮最高的人——28斤半。我们兄弟四个一个妹妹,口粮一个比一个少,总不够吃。一度,我家成为享受粮食补助的人家。那么麻烦的申请过程,真不晓得我母亲是怎么办

到的。三年困难时期,因为我母亲留一位农村的讨饭老人喝了两碗米面菜叶粥,引起了些邻居街坊的闲话。母亲一赌气,自行中止了补助。父亲探家的日子里听我们讲到了此事,以后每月从自己的口粮中省出5斤,换成全国粮票,月月随信寄给我们。

三年困难时期,哈尔滨市各粮店实行每月分三次供给制。怕有的人家不按计划吃粮,一总买回去,半个月吃光了一个月的粮,那可咋整?眼瞅着一户人家挨饿不是回事,实行紧急救济岂非等于怂恿?于是通过粮店替市民计划,每10天供给一次。

民间有民间的应对策略——若某街区的买粮日是五日,而另一街区是十日,后者便可在十八日时向前者借粮,前者也可在十二三日向后者借粮。亲戚之间更可以靠此法互助,共克时艰。

当年,有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,放学回家后,发现家里的粮不够做成一顿饭了。而他母亲上班前,说过他可向谁家去借粮。那人家有他同班的女生,他脸皮薄,不好意思去借。怎么办呢?他产生了一个歪想法——将上次买粮的日期进行涂改后,自以为聪明地赶到粮店下班前去买粮。结果他家的粮本被扣下了。

那小学五年级学生便是我。

购粮证取消了,粮票作废了……

我印象中,自1964年起,大多数哈尔滨人家摆脱饥饿阴影的笼罩了,因为蔬菜供应充足了。东北的菜都是高热能蔬菜——土豆、萝卜、茄子、豆角、大白菜、窝瓜,很顶粮的。东北的西红柿、黄瓜也比别省的更好吃。小孩子吃饭时,往往喜欢多吃菜,口粮自然省下了。

四年后,“上山下乡”开始了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全省的大小农场,以小麦收播为主,终年口粮是面粉,想吃粗粮都没有,这使从小到大难得吃上细粮的哈尔滨知青如至福地——起码在吃的方面有此感觉。

哈尔滨知青探家时,不分男女,皆尽可能多地往家带白面、豆油。若结伴探家,互相帮助,谁都能往家带四五十斤。若还有人接站,也有带更多的。而若一户人家有两名知青,那么每年便有一个儿女探家,每年这一户人家就会多吃到四五十斤白面。平均每月多了四斤白面,对任何一户人家,都意味着是粗细粮比例的重大改变。这一户人家从过春节起,几乎可以在一个月天天吃面食了。

我探家是从没有人接站的。

我每次也至少带四五十斤白面。有次居然带了八十来斤,装两个大旅行兜里,用粗绳拴在一起,下车后搭在肩上,步行回家。那是冬夜,当年没出租车,公交车也收班了,只能步行。走走歇歇,十几里远的路,走了两个多小

时。累是肯定的,但一想到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年内可以少吃粗粮多吃白面了,觉得那份累太值得了。我三弟也成为兵团知青后,我家从不缺口粮了,而且还成了经常吃白面的人家,那在当年是很受没有知青的人家所羡慕的。

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,从单身青年到结婚到成为父亲,十八年间一直住在一幢筒子楼内。那幢老楼离北影食堂甚近,五十步不到。所以十余年间,全楼的人家基本是吃食堂的人家,我家也不例外,一年到头去不了几次粮店,便很少用到购粮证。

忽一日听说购粮证取消了,粮票作废了,竟独自发呆了半天——就在此前不久,我还用一笔稿费求人代买了整整一百斤全国粮票,打算给父母寄回哈尔滨去,让他们分给弟弟妹妹三家。弟弟妹妹和弟媳夫都是工人,怕他们粮食不够吃。

如今,每当看到或听到“粮”字,思绪往往会回到从前,于是感慨万千。而看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给我的感觉居然不是现实的,而似乎是神话性的,或超现实的——中国民间能用粮食做出那么多口味美妙的特色小吃来,是我这个中国人从前无法想象的。

三十余年间,中国之往昔今朝,确实可用沧桑巨变加以形容。凡过来人,都应多讲讲……⑬1(摘自《解放日报》)